

白話文人物志 前言

人類的發明由社會需求推動，印刷術無論雕版還是活字，技術並不複雜，之所以出自中國，是因為本土最早產生了巨大的需求。佛教在中國傳播，佛經流通廣布，現存最早的印刷書籍便是唐咸通本《金剛經》（公元八六八年），發現於敦煌（現藏大英博物館），其內附插圖，印刷精美，顯示當時的技術已然成熟。科舉考試或許是刺激印刷技術的另一需求，隋代開皇三年（五八三）詔舉賢良，科舉制度登場，在三四百年間，讀書人的生產和書籍的生產彼此促進，無法知其詳情。宋代刻書至盛，無處不刻書，無書不刻板，政府與民間合力，書坊遍地。中國唐以前的文獻能夠保存如此之眾，與宋代的印刷興盛密不可分，而宋代印刷業倚靠的是科舉考試造就的識字之人。由印刷術推動的社會進步和巨變，日本史學家宮崎市定稱其為宋代文藝復興，在四百年之後再次敷演於歐洲。中國白話小說的發展與印刷

技術的發達幾乎同步，我甚至想說，沒有印刷書籍的發行，就不會有中國書面語的文白分流和齊頭並進，當時白話文寫通俗小說，雖不登大雅之堂，卻有廣泛的讀者，從朱熹到王陽明，他們都並不輕視白話。

二十世紀中國的白話文運動迅速普及，與印刷技術的廣泛利用和西式教育的大力實行相關。一百年以來，幾代知識分子利用現代報紙、期刊、學術機構、大學課堂和公共會堂的講演，推行國語運動和文學革命，冀求以國語的文學，建立文學的國語。回顧歷史，重述往事，緬懷前賢，檢討來路，述寫人物志，追尋漢語文脈，為的是薪火相續。

如今印刷書籍正在被電子傳媒所遮蔽與取代，寫作的基本觀念也有所改變，大家獲得資訊越來越便捷，單純介紹生平普及知識的文章，似不再有必要了。

回想梁武帝曾命周興嗣作《千字文》，四言成句，對仗工整，上至宇宙自然，下至

人文歷史，日常物類，名人典故，無所不包，字不重出而文采斐然。明清兩朝以八股取士，講究起承轉合，聲律鏗鏘，短文四五百字，長文七八百，普天下讀書人為這千字短文殫精竭慮，一千多年的科舉之路，趨之若鶩，一朝釋然，文章何去何從？

廣東新會的梁啟超和浙江海寧的王國維是二十世紀極不平凡的中國人。梁任公意氣風發，參與戊戌政變，其時務文體，令讀者若飲狂泉，乃晚清至民初報章文字第一寫手，若以文字影響現實論，無人能出其右。王觀堂學問精深獨絕，詩詞高韻深情，雖深受康康叔本華影響，卻早已被中國文化所化，中西矛盾，新舊衝突，可愛（情感）與可信（理智）的難於調和，終於屈子後塵。

百年以來，漢語口語和書面語經歷了很大的變化，構成漢語語境的許多要素發生了轉移，我們對於自身母語的認知也隨之而改

變，這一過程複雜而難於索解。現代中國與傳統中國最大的不同，即文言體制的消亡，士農工商向現代公民的轉變。人在改變語言、改變使用語言的方式，同時也被自己使用的語言所改變。今所作「白話文人物志」，是將百年中國社會視作一個整體，每位新舊人物自有其命運，不求全面評價其人其文，只存其與白話文相關、或與語言文字相關的論述見解，鋪設全方位思考白話文體的背景參照，探求二十世紀初以來不同的個人對於語言文字表述之道的經驗和貢獻。

以白話文體的角度、修辭思維的視野，重新看待分析歷史人物及其言論，是我梳理白話文百年流變歷史的個人化選擇，僅僅出於談問題之需要，重提舊事非僅為紀念，更為廓清時下面臨的問題：思想和語言——表達的問題，白話文運動造成的種種困境，如何接續文脈，以自身的文化傳統更好地融入現代社會。



白話文人物志 李春陽

拆解建築

國際建築大師、普利茲克建築獎獲獎者磯崎新首個聚焦中國項目的研究展在四川省成都市開展，展覽以模型、建築圖、版畫、裝置、影像等媒介，重點呈現磯崎新在中國的十二個建築和城市設計項目。

中新社



▲展覽現場展示的磯崎新上海世博演藝中心項目設計效果。



市井萬象

為自己而寫作



黛西札記 李夢

第一次獲邀為小學生講座，與五年班的八十多位學生，分享閱讀和寫作經驗，著實有些忐忑，畢竟小學畢業已經二十年，那個年紀的小孩子喜歡什麼、在乎什麼，對我而言，已然是久遠模糊的往事，加上現今科技發展、時代進步之高速，今天少年的認知與閱歷，肯定遠勝當年。所幸同學們自始至終都很配合，耐着性子與這位不太幽默的姐姐愉快互動，讓我感動不已。

校長給我布置的題目是「怎樣成為一位作家」，慚愧，儘管已出版過一些作品，我到今天都不太好意思說自己是一位作家。在香港寫作，難，全職寫作，更難，不然依我自由散漫的性格，早就辭去朝九晚六的工作周遊列國了。為了讓氣氛活躍一些，我一開始便問大家：寫作好玩嗎？應者寥寥。不氣餒，再問：「喜歡寫作的同學，請舉手。」中排和後排，五六小手舉起來，有些怯生生望一望身邊同學，又放下。

我忍住笑，問沒舉手的同學：「為什麼不喜歡寫作？」眾人頓時興致來

了，這個說「不知道寫什麼」，那個說「擔心老師不喜歡自己寫的東西」，更有甚者，說「中文字筆畫太多，好難寫」。像極了當年被迫彈琴寫字的我。

我用「學習觀察」「享受閱讀」和「勇敢表達」三個小技巧，回應同學們的煩惱。山川自然，雲起霧散、日升月落，皆有奧妙，我們在放學的校巴上或旅行途中，便可細心觀察，累積寫作靈感。另外，自己小時候不喜歡背誦唐詩宋詞，可被迫讀得多了、背得多了，慢慢也便發現詩詞的美與奧妙，長大後在寫作與表達時，便可引用二三，為文章增添詩意。唐詩用字的凝練，宋詞的節奏，乃至白話小說描寫之生動，今天看來都對我的寫作帶來不可取替的影響，所謂「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有時候，時機與緣分到了，一切便豁然開朗。

最後，我舉幾位著名作家的例子，說他們成名前也曾遭遇退稿與批評種種磨難困境，好在並未放棄，堅持表達自我、直抒心意，最終其作品也便打動了大多數讀者。守得雲開見月明，道理大家都懂，可真正做到的，又有幾人？從這角度講，難的不是寫作本身，是找到並守護「為自己而寫作」的真純。

打造理想城市



英倫漫話 江恆

巴黎奧運即將揭幕，除了精彩的體育比賽，近年在當地推廣的「十五分鐘城市」概念也吸引眼球，值得前去親身體驗。

該概念作為城市規模藍圖，由法國索邦大學科學家卡羅斯·莫雷諾於二〇一六年創造，顧名思義，它是讓一座城市的居民在十五分鐘內，於步行或自行車程可及的範圍內，滿足食衣住行育樂等基本生活需求。目前從巴黎、米蘭到布宜諾斯艾利斯等很多城市正在嘗試實施這個概念。

除了促進生活上的快捷和便利，莫雷諾在《十五分鐘城市》一書中還強調此概念具有的人文意義。比如許多現代城市都是以男性為出發點設計的，意味着他們在中心區工作，家人則住在外圍的非中心區，汽車或地鐵等交通工具成為重要依賴，也產生很大的時間成本。與此同時，城市也被人為地劃分成不同功能區，如行政區、金融區、工業區和商業區等等，客觀上造成人口的貧富分化。以巴黎為例，在東北部不太繁華的地區，高達百分之四十的房屋是政府出資的公營住宅，而在較富裕的西部地區，這一比例降至百分之五以下。

恰是基於上述原因，「十五分鐘城市」有助於結束城市以男性為中心的時代，並致力於打破貧富分化等多重藩籬。以住房為例，該概念提倡將公屋、居屋和私樓等混合修建在一起，使不同社會階層能夠和睦共處。從人性化考慮，把學校和兒童活動區離家庭和家長工作地點更近，將診所放置在社區便於照顧居民，以及開闢公園、運動場等來改善共用空間。

莫雷諾在「十五分鐘城市」概念中尤其強調綠地的使用，認為不僅幫助優化環境，改善生活質量，也能促進生物多樣性和應對氣候變化，使城市更加宜居。他在書中引述科學研究指出，綠地的最大好處是當人們看到城市環境中的綠色植被時，他們的行走速度會變慢，習慣把頭抬得更高向四處觀望，而不只是盯着地面，視覺、呼吸和心率等指標大為改善，漫步其中又怎能不讓人心身舒暢。

然而，「十五分鐘城市」在英國卻是個爭議性的話題，遭到很多人反對，當中有不同利益訴求的團體。比如質疑政府利用城市規劃剝奪人們出行自由的陰謀論團體；不滿政府以環保為由限制排放的汽車游說團體；擔心建造混

合住宅導致低收入者湧入富人區的團體等等。在種種反對聲音下，牛津郡打造「十五分鐘步行生活圈」的計劃，因當地居民抗議而被迫中止，就連倫敦市中心最繁忙的購物區牛津街步行化的嘗試也以失敗告終。以至於有英國媒體將英國與法國作對比，指一海之隔的法國在推動「十五分鐘城市」時並無太多阻力，今天沿着巴黎塞納河漫步，那些新建的小型公園和戶外酒吧的所在地，很難想像以前是一條交通擁擠的高速公路，這與牛津郡所遇到的窘境形成鮮明對比。

有英國科學雜誌指出，這與英國人習慣生活在舒適圈有關，他們忘記英國的城市也是隨着時代而不斷演變和完善。比如十八世紀時，隨着工業革命到來，英國城市急速擴張，人們不斷湧入倫敦、曼徹斯特等大城市工作和生活，也帶來混亂和無序。典型例子是當時城市布滿縱橫交錯的狹窄街巷，人和馬車的急劇增加造成嚴重交通擁堵。據史料記載，在一七四九年，一起發生在倫敦橋上的交通堵塞困住了數百人，在將近三小時後才重新疏通。到了十八世紀末，隨着大片區域的老舊房屋被逐步拆

除以及修建新的馬路，人們出行不便和交通擁堵等問題才得到緩解。

如同英國歷史學家本·威爾森在《城市六千年史》書中所說，城市這東西又吵、又擠、又混亂，卻是人類最偉大的發明之一，即使到了今天，城市發展日趨完善，人類仍未停止打造理想城市的步伐。作家理查·桑內特在《城市不服從》一書中也強調，自上世紀二十年代開始，從法國建築師柯比意提出的垂直式反烏托邦實驗，將一大片具有歷史意義的巴黎中心地帶，改造成外觀統一的建築，而每一座建築的用途都經協調指定，再到美國學者珍·雅各倡導的理念完全相反的開放式都市願景，乃至如今莫雷諾提出的「十五分鐘城市」概念，無不是大師們在為理想城市不斷進行探索。

究竟什麼是理想城市？暢銷書作家托馬斯·科蒂斯根在《黑客地球：地球工程讓我們重新想像未來》一書中指出，理想城市必須要引領大自然的重生之路，使人類更加適應氣候變化的時間跨度不斷縮短。但就像當初難以想像智能手機的出現，我們能想像出真正理想城市的圖景嗎？

星光永照天宇



人與事 管喬中

在今年七月十七日楊福家院士辭世兩周年紀念之際，復旦大學舉行「楊福家星」命名儀式暨《楊福家畫傳》發行儀式。

「楊福家教育基金」啟動儀式、紀念楊福家先生逝世兩周年學術報告會，我與夫人王建瑜因身在歐洲未能回國參與這一莊重而有意義的活動，深感遺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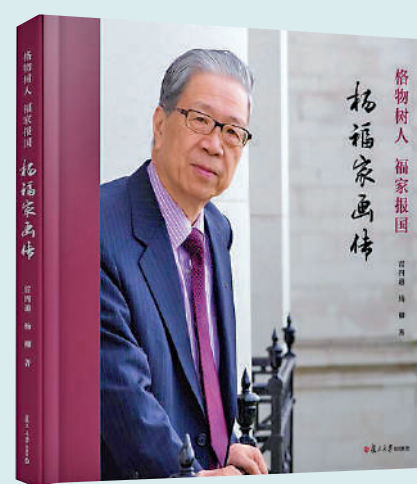
楊福家先生自青年時代負笈復旦始，就懷抱科學報國的深厚情懷和高遠理想，二十四歲成為中國重點高校最年輕的物理系副主任。以非同凡響的稟賦、勤勉勇毅的精神，在科學研究的廣漠上，走出了一條非凡的人生之路，成為舉世聞名的核物理學家、教育家。「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兩年前，楊先生悄然離世，騎鶴西去。但他的家國情懷，篤學創新、追求卓越的精神、倡導博雅的教育思想，鑄造成的人格風範，成為當代學術界、教育界以及青年學生學習的典範。

我和楊福家先生是忘年之交，也是莫逆之交，相交相識二十多年，我一直忘不了知遇之恩。楊先生曾為我的政經評論集《香港第三隻眼睛——龍年吹角連營》一書作序。楊先生稱：「他是一位商人，更是一位文人，是一位善於獨立思考的知識分子，是一位憂國憂民的『理想主義者』」；又說「政論時評，有實事求是之心，無嘩眾取寵之意」，「懷着赤誠之心，發出聲音也是真誠的。動機和出發點是把國家和民族的利益放在首位」。這些話語，既是楊先生對我的勉勵和肯定，也表現出楊先生對人對事評價的價值標準。楊先生長期擔任寧波諾丁漢大學校長，特聘我為寧波諾丁漢大學顧問委員會委員、客座教授。二〇一五年五月、二〇一六年九月和二〇一九年十一月，楊先生先後三次邀請我赴寧波諾丁漢大學，分別作《魯迅與胡適》、《人與五個世界》以及《凱普回顧與展

望》三次演講，而且三次都是他親自主持。楊福家先生對我的學術報告給予了充滿人文關懷與科學理性的評價。所以，楊先生是我的知情人。

楊福家先生離開我們兩年了。但我們總感到他從未離去，他的音容笑貌一直活在我們心中。近日，我們剛好在丹麥，便專程去參觀了被譽為「科學聖殿」的哥本哈根尼爾斯·玻爾實驗室。這裏，不僅是物理學史輝煌篇章的書寫地，也是楊先生當年承載着國家榮譽與民族希望的重託，遠赴重洋求學的起點——一九六三年，楊先生被選派到玻爾實驗室做訪問學者，從事核反應能譜方面的研究。在玻爾實驗室求學的日子，楊先生與小玻爾亦師亦友，既互相成為學術引路人、探索者，又是科學工作中相互扶持的好朋友。這段經歷，使楊先生在科學認知上達到新高度，同時深刻塑造了立身處世、追求卓越的人生觀與價值觀。楊先生曾經與我分享他在玻爾實驗室的感受：每時每刻如同置身於智慧與靈感的激流，每一次實驗、每一次討論，都激發着他對科學無盡的好奇與熱愛，也讓他深刻體會到，科學沒有國界，作為科學家，要追求真理，更要勇於擔當，但個人心中要永遠裝着國家和人民，個人理想也要融入國家與民族復興大業。

站在莊重、樸實而又神秘的玻爾實驗室門前，我們更是能真切感



▲《楊福家畫傳》。

受到楊先生當年對國家承擔的責任、對祖國深厚的愛以及在特殊科學研究上必須追求卓越的執著情懷。反觀當下，雖不乏在各自科學領域發光發熱取得傑出成就者，但社會上也出現一些追名逐利之徒，如果將其與楊福家先生這種「將個人命運與國家興衰緊密相連的情懷，對國家和人民深沉的愛」的精神品格相對照，高下立判。

楊福家先生在下九十年代曾七次受邀出席美國總統早餐會，理解領會了美國即將全面推動科技創新的信息，他便推動科學創新的新體制並開始在全國各地推廣傳播「知識經濟」新理念。機緣巧合之下，我成為聆聽楊院士「知識經濟」的受益者。每次聆聽他的教誨，都是如飲甘醇，如沐春風。楊先生曾在多次不同聚會與演講中說：要真正將「知識經濟」理念在內地落地生根、並轉化為生產力，推動國家科技進步。每每想起楊先生的這段話，我心中總是感慨萬千，既感到自豪又感到慚愧，自豪的是選擇了正確的道路，慚愧的是往往心有餘而力不足，未能將理想抱負做得更好。在楊先生「知識經濟」與「科技創新」理念的引領下，我和夫人從教育報國的理想到，轉變為科技報國的抱負，創立香港科創公司和凱普生物科技公司。創立之初，楊院士就為凱普發展指出明路——「凱普產業發展必須緊貼二十一世紀科技前沿」。因為他的指引，凱普邁進了知識經濟領域，慢慢走上了科技創新產業化道路。

星光永照天宇，精神萬古不磨。我們為「楊福家星」命名儀式及紀念楊福家先生學術文化活動的舉辦感到欣慰，我們為宇宙星空中永遠有一顆璀璨的「楊福家星」感到驕傲和自豪。願我們共同守望與傳承「楊福家星」所蘊涵的精神文化遺產，也由衷希望學者們、青年學子們都能傳承、弘揚楊先生熱愛祖國的崇高情操、追求卓越的精神氣度、倡導「博雅」的教育思想，以淵博儒雅的人格養成為目標，奮發努力，成為社會的棟樑，為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貢獻力量。